

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典范之作

路 宽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 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是对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转译性作品,其在转译过程中采取了富有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的独特方法;该书的主要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因而它是中国首部系统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此外,该书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渠道由日本转向俄国的标志性著作之一。对《现代社会学》的文本性质、主要内容、译介特点和文本贡献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的认识。

关键词 瞿秋白 《现代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 早期传播

(中图分类号) A81;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09(2015)12-0109-07

DOI:10.14110/j.cnki.cn-37-1059/d.2015.12.016

长期以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研究往往聚焦于什么人完成了什么著作,而缺乏对著作的深层次考察;宏观整体的研究较多,微观个案的研究较少;达到了一定的广度,然而缺乏应有的深度。不过,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研究要走向深入,文本研究是一个必要的环节。文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物质载体,只有对文本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内容、特点和水平。

《现代社会学》^①出版于1924年,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瞿秋白的代表性作品,也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典范之作。对这个文本进行“解剖麻雀”式的解读,对其文本性质、主要内容、译介特点和文本贡献进行认真的考察,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文本研究。

一、《现代社会学》的文本性质

明确文本性质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第一步。搞不清文本的性质,不仅难以把握文本形成的特点,也难以把握文本内容。《现代社会学》是一个典型个案。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导致学界对《现代社会学》的文本性质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四类观点:

其一,《现代社会学》是瞿秋白的原创性著作。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安启念、陈铁健等。安启念写道:“《现代社会学》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②。陈铁健指出:“《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是瞿秋白继李大钊、陈独秀之后,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著作”^③。还有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项目编号:08JJD71002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路宽,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发展。

^① 本文所依据的该书版本是《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② 安启念《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3页。

^③ 陈铁健《瞿秋白传》,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一些专门研究瞿秋白及其著作的学术论文和博硕士论文也持类似的观点。

其二,《现代社会学》是参考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①一书而写成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庄福龄、姚守中等。庄福龄等主张,《现代社会学》“参考布哈林的著作《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社会科学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规律”^②。姚守忠等认为,《现代社会学》“是秋白将布哈林所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进行消化、吸收、批判、扬弃后,经过选择、鉴别写成的。故《现代社会学》是秋白的再创作,具有他自己的特色”^③。

其三,《现代社会学》参考的不是《理论》,而是其它著作。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丁守和,他认为,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实际上“是讲社会科学,……并引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及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中的观点”^④。

其四,《现代社会学》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转译性著作。黄楠森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认为,“《现代社会学》除第一章外,则几乎是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转译”^⑤。杨春贵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教程》也有同样的表述。田子渝等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则认为,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是布哈林《历史的唯物论》的“中文解读本”,“《现代社会学》第1章、第4章,直接取材于《历史的唯物论》的第2章、第5章”^⑥。

笔者赞同黄楠森和杨春贵等学者的观点,即主张《现代社会学》除第一章外,基本上是对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转译。要令人信服地确定这一点,就必须对《现代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文本比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结构为一个导言和八章内容,《现代社会学》的内容则是分为五章,共6万余字。笔者经过比对,得出如下结果:

首先,从章节标题的对比来看,前者的第一至四章与后者的第二至五章,彼此的章节标题是一一对应的,表达的意思也几乎是相同的。现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一章和《现代社会学》第二章的目录列表如下: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现代社会学》章节标题之比较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一章目录	《现代社会学》第二章目录
第一章 社会科学中的原因和目的(因果性和目的论)	第二章 社会科学之原因论与目的论
第七节 一般现象特别是社会现象的规则性	第一节 一切现象之规律性
第八节 规律性的性质。问题的提法	第二节 规律性之性质及设问之方法
第九节 一般的目的论及其批判。内在目的论	第三节 目的论及其批评内在的目的论
第十节 社会科学中的目的论	第四节 社会科学中之目的论
第十一节 因果性和目的论。科学解释是因果关系的解释	第五节 原因论科学的解释是原因的解釋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现代社会学》第二章的章节标题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一章的章节标题的一种转译(有的标题是直译,有的则是概括性的意译)。进一步比较可以发现,实际上,《现代社会学》的第二、三、四、五章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第一、二、三、四章,每章所包含的节数分别都是5节、7节、6节、5节,仍然完全相同。两者从章到节的标题也是基本相同的。

①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成书于1921年底,出版后曾在苏俄产生很大影响。本文所依据的该书版本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译者为何国贤、李光谟等。

② 庄福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0页。

③ 姚守忠、马光仁、耿易《瞿秋白年谱长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④ 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⑤ 黄楠森、庄福龄、林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页。

⑥ 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

其次,从著作内容的对比来看,两书这四章对应的每一节的内容也大致相同。现从四章中各选一例列表如下: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现代社会学》内容之比较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现代社会学》
“然而,实际上谁也不这么想。因为大家都十分明白,面包不会在松树上长出来。大家都注意到,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都存在一定的规则性即一定的规律性。揭示这种规则性,是科学的首要任务。”(第一章,第10页)	“实际上,决没有这样的人,——以为米会长到松树上去。大家都可以看见:自然及社会之中同样有一定的规律性。发见这种规律性,便是科学的第一要职。”(第二章,第402页)
“如果在两个或几个因果链条(系列)交互作用时,我们只知道其中之一,那末这种交互作用下产生的现象,在我们看来就是偶然的,尽管事实上它是完全合乎规律的。”(第二章,第38页)	“假使‘相交’的两排原因,或几排原因之中,我们只知道一排,那末,这‘相交’而得的现象对于我们便是偶然的。——其实这种现象本来是有规律性的。”(第三章,第425页)
“既然世界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就必须从相互联系中,而不是从绝对独立(隔绝)的状态中观察现象。实际上,世界的所有各个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处地方发生了极小的移动、变化,其他一切都会因之而变化。变化的程度是另一个问题,但确有变化。”(第三章,第65页)	“因为宇宙永永在动之中,——所以研究一切现象,应当看他们之间的联系,而不可以刻舟求剑的只见‘绝对的分划’。实际上宇宙的各部分互相联系,一部分小有变动便能影响到别部分,牵动全局。他能有多少影响,却另是一个问题。”(第四章,第442页)
“总的来说,由于有了经常的相互作用的范围,也就有了特殊的体系,特殊的现实的集合体。最广泛的、包含人们之间一切持续的相互作用在内的相互作用的体系,就是社会。”(第四章,第92页)	“总之,只要有经常互动的各种现象的一个范围,——这一范围便是一个现实的总和,一个系统。包含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经常的互动现象之最广泛的系统——便是社会。”(第五章,第457页)

对比可知,《现代社会学》的第二至五章的内容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一至四章内容的转译。从整体上来说,除第一章是瞿秋白本人所撰外,《现代社会学》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转译性著作。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被布哈林称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瞿秋白以其扎实的俄语基础和文字功底,选择该书的部分内容翻译成中文,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一大贡献。诚如有的学者所言:“在布哈林这部著作尚无中译本的情况下,他的这些阐述和说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①

二、《现代社会学》的主要内容

对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译作,要准确把握其精髓,就必须关注源文献的内容,否则便可能造成理解上的偏差。具体到《现代社会学》来说,其内容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对此,学术界就存在争议。

有学者认为,《现代社会学》主要是阐发唯物史观的著作。如黄楠森等提出“瞿秋白和当时的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重点宣传的也还是历史唯物论。”“他的《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基本上是阐述作为一般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现代社会学》中辩证唯物主义不过是其中

^① 庄福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页。

的一章而已。”^①郭建宁也持此说,其云“瞿秋白和当时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重点宣传的也还是历史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瞿秋白这几本书的主要内容。比如,《现代社会学》中辩证唯物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章而已。”^②

也有学者认为,此书主要是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例如唐宝林强调,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和李达后来所著的《现代社会学》相比,“李达主要从唯物史观方面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而瞿秋白则从辩证唯物论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更为全面和准确的介绍,是中国最早阐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著”^③。宋志明认为,瞿秋白“堪称在中国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现代社会学》则更为具体地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并详细地论证了“社会科学中的根本方法就是互辩的唯物主义”^④。

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即《现代社会学》主要是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

从《现代社会学》的文本内容来看,该书共设五章,第一章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定义社会学之内涵,以及社会学与理化科学、生物学、心理学、集体心理学及其它社会科学的关系;第二章章题为“社会科学之原因论与目的论”,阐述了辩证法中的原因和结果这对范畴;第三章章题为“有定论和无定论”,主要讨论哲学上所谓“意志自由”的问题,以及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问题;第四章的章题为“社会现象之互辩律”,首先阐述了哲学上的基本问题,指出互辩法主要是从事物的联系和运动中去考察一切现象,社会学中的根本方法就是互辩的唯物主义,此外还讨论了对立统一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第五章主要是运用联系的观点、系统的观点,以及整体和部分辩证关系的原理,分析和阐述社会之内涵,指出社会是人与人互动关系之系统,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物质的生产过程。除第一章导言外,其余四章,显而易见主要是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说,辩证唯物主义构成了《现代社会学》全书的主体。

既然从《现代社会学》的文本可以判定其主要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那么为何还会出现上述争议呢?问题应该出在源文献的书名——《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上。实际上,《现代社会学》并未翻译《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唯物史观。该书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至四章,主要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二部分是第五至八章,重点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瞿秋白选择了第一部分予以转译,这一部分遂构成《现代社会学》的主体内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五至八章的章题分别是“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平衡”、“社会要素之间的平衡”、“社会平衡的破坏和恢复”、“阶级和阶级斗争”。据此可知,这四章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最核心的内容,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社会结构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等。但是瞿秋白并没有转译这四章。

通过对《现代社会学》主要内容的探究及其与源文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容的比对,可以澄清学界关于该书主要内容之认知的误区。该书的主要内容,毫无疑问即是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是瞿秋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点所在。事实上,经由日本、西欧、苏俄等不同渠道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有很大区别的。日本和西欧渠道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侧重学理,重视唯物史观的研究,将唯物史观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瞿秋白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李大钊、李汉俊、陈独秀等,因为深受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影响,所以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国内的传播,重点在于唯物史观。李大钊曾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三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并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⑤。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偏重于

① 黄楠森、庄福龄、林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页。

② 郭建宁《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③ 唐宝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页。

④ 宋志明《中国现代哲学通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页。

⑤ 《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实践,重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定义为辩证唯物主义,而受苏俄渠道影响的瞿秋白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自然把重点放在了辩证唯物论上。在瞿秋白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学说决不能以唯物史观概括得了”^①;马克思主义“对于现实世界里的一切现象都以‘现代的’或互辩法的(dialectical)——即第亚力克谛的唯物论观点去解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哲学”^②。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包含四个部分的内容,即“互辩法唯物论”、“唯物史观”、“无产阶级经济学”、“科学的共产主义”^③。他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点,很好地满足了国内的需要,其代表作即是《现代社会学》。

三、《现代社会学》的译介特点

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的转译性文本是怎样形成的,这种转译是完全忠实于原著的翻译还是有所改变和加工?这种改变和加工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影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哪些特点?要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探究文本形成的方法是必由之路。

瞿秋白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转译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加入了中国元素,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国语境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其一,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哲学原理作出独特翻译,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进行了大胆尝试。例如,该书第二章的标题现在翻译为“决定论和非决定论(必然和意志自由)”,而瞿秋白根据其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在《现代社会学》中将之翻译为“有定论与无定论”。《大学》中说“知止而后有定”。朱子解释说“知之,则志有定向”^④,意为有明确的人生目标才能志向坚定。“有定”,在这里的意思是志向坚定不移。瞿秋白将之引申为意志不自由、受到束缚,用“有定论”概括“主张意志不自由,受环境束缚的学说”,用“无定论”来概括“主张人的意志自由不受束缚的学说”^⑤,应该说,这个翻译是十分精当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通,因而非常易于理解^⑥。该书第三章的标题是“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这个词早已由日本传入中国,但瞿秋白不喜欢用这个日文译名,而是使用了“社会现象之互辩律”,在文中使用的是“互辩的唯物主义”、“互辩法”或“互辩律”。他后来指出,“互辩法”是“Dialectics”的意译,日文译作“辩证法”不甚确切。“互辩法的原义,本从希腊文‘Dialog’——‘对话’而出,意义是互相辩驳;至于互辩法一词哲学上的意义,实在是:相反者往往相成,矛盾者有时可以互变。……所以如果译义,则不如译为互辩法及互变律,两词可以互用,重要却在那一个‘互’字上”^⑦。应该说,这是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所作的独特尝试。

其二,结合中国社会的事例阐发哲学原理,使用中国语境中的例子取代俄国经验,从而增强了效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例如,为了批判目的论,批评“以为一切都有一定的目的之学说”,阐明“‘目的’只有有意识的生物方才能有;有意识的生物方能自己立一个目的”和只有野蛮人才往往以为自然界一切有灵的道理,瞿秋白举了庄周的例子予以说明,并批判了张君勱所主张的玄学的人生观。他写道“中国古代的庄周已经说‘复仇者不折镆干,虽有忮心者不怨飘瓦。’那些目的论派,真像野蛮人,——竟要‘怨及飘瓦’,——因为他们以为全宇宙(或全社会,或所谓‘人生’)确有一目的,为‘不可思议的’人所立,张君勱所谓‘其所以然之故,至为玄妙不可测度’。可见‘目的性’、‘适当性’等类的意

①②③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8、20页。

④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⑤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6页。

⑥ 继瞿秋白之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在20世纪20和30年代的几个中译本,都接受和使用了“有定论”与“无定论”的译法。

⑦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64页。

义,简直于客观宇宙绝不能应用,而宇宙间的规律性,亦并非目的论的规律性。”^①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常举俄国社会和文化的例子,如果瞿秋白照译过来,势必会产生“水土不服”,失去生动通俗之效果。因此,瞿秋白用符合中国语境和实际的例子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俄式例子进行了替换。例如,为了说明神鬼等不过是人类自己按照现实世界的状态创造出来的东西而已,他改用了中国文化中的例子,写道“人类社会分裂而成各种部分之后,少数人管理、命令、统治,而多数人受管理、受命令、受统治,于是大家照着这样的‘规范’去比附全宇宙——所谓‘作之君,作之师’,以至于五行生克阴阳男女尊卑等等,无不如此。地上有皇帝、法官、地方疆吏,天上就有玉皇大帝,天下都有城隍土地、日巡、夜巡等等,以至于草一木都有神,神之间都有等第。”^②

其三,不仅对较为晦涩难解和较为冗长的内容予以删除或概译,而且在转译过程中提出了独特见解,丰富和充实了相关哲学原理。例如,瞿秋白删除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二章第十七节中的一段介绍偶然性“直接导致对超自然力量、对上帝的信仰”的例子,即“很值得注意的是:那种郑重确认偶然性的学说,直接导致对超自然力量、对上帝的信仰。所谓神的存在的‘宇宙学论据’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它宣称:既然世界(宇宙)不受规律性约束,那末显然它应当有它存在和发展的特殊的始因。这种所谓的论据也因此被称作‘世界偶然性的论据’(‘e contingentia mundi’)。在亚里士多德、西塞罗、莱布尼兹、克·沃尔弗等人的学说里,都可以遇到这种论据。随着资产阶级的衰落和瓦解,偶然性的学说又重新流行起来(例如,法国哲学家布特鲁、柏格森等人)”^③这一段显然篇幅较长。实际上第二章第十五节和第十六节的主题就是阐述偶然性问题,且已经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而第十七节的标题是“历史必然性”,主要是阐发必然性问题。因此,此处删除这段关于偶然性的论述,并不影响对全文的理解,反而突出了内容的一致性。再如,瞿秋白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介绍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的冗长文字进行了概译,在减少了篇幅的同时,也使内容变得更为通俗易懂。又如,在转译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三章第十九节中关于物质与意识辩证关系的内容后,瞿秋白提出自己的见解“物质当然是宇宙间一切现象之根本”^④。这里瞿秋白更强调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他还将原文下一段中“唯物主义认为第一性的、基本的东西是物质,唯心主义则认为是精神”^⑤译为“唯物论以物质为宇宙根本,而唯心论却以精神”^⑥,既强调了他本人的看法,也是对原文内容的点睛之笔。

第四,适中的篇幅内容和简洁晓畅的语言风格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瞿秋白在转译过程中非常注意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篇幅内容和语言风格的调整,使得《现代社会学》一书篇幅适中、语言简洁、文字流畅,整体上可读性更强。从标题上看,几乎所有标题都比《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对应的标题短,很好地概括了每一节的内容。从内容上看,每节内容基本上控制在1到5页,大部分篇幅在2到4页之间。对原文或删减或选译或概译,使全书的结构更为紧凑、严密,非常适用于中国读者学习领会。

通观《现代社会学》的文本可知,瞿秋白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做的并不是简单的译介工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并不是苏俄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复制。马克思主义在被译介的过程中,传播者即有目的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中国文化和中国语境相结合,传播本身即带有中国化的鲜明特色。

四、《现代社会学》的文本贡献

《现代社会学》以其新颖的内容、独特的方法,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早期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其一,从文本形成的方法来看,瞿秋白不仅是苏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

^{①②④⑥}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5、405~406、435、435页。

^{③⑤} [苏]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何国贤、李光谟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53页。

开创者。瞿秋白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内容进行了选译和转译,并在转译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和中国语境相结合,使《现代社会学》的基本内容既忠实于原著,同时也带有中国人自己的语言特色、风格和气派,这样既易于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也易于被读者理解,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瞿秋白对文章的内容篇幅和语言风格进行调整,力求适合中国读者学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其二,从在同时期各种文本中的地位来看,《现代社会学》是在中国最早系统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著。在瞿秋白之前,已经有人开始向中国介绍和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如1919年7月18—24日《晨报》副刊连载的译文《马氏唯物史观概要》中曾提到“马克思学说的构成分子,就是当时世上流行的辩证法的思索法和唯物论的观察法。他学说的新特征,就在于把这两个东西结合拢起来就是了。”“其实辩证法,可算是进化的思索法,换句话说,就是将一切事物,作为历史的考究。因为一切事物是变化不息的。所以要理解事物,便不能不理解他的生死和盛衰。”但从总体上说,这些介绍是零星的和碎片式的,无法给人们以整体系统的认识。《现代社会学》则首次较为系统地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其三,从文本的来源看,《现代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主渠道由日本转向苏俄的标志性著作。我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主渠道最初是日本,当时主要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等文献的底本都来自日文。后来,苏俄逐渐取代日本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播的主渠道。在第一批传播者中,掌握俄语的人只有瞿秋白、杨明斋、俞颂华等,瞿秋白是其中的佼佼者^①。1920年,瞿秋白作为《晨报》记者被派驻莫斯科,在那里系统学习和接受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研读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等最新的苏俄马克思主义研究论著;1923年返回中国后,他开始系统地向国人传播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现代社会学》即是其主要成果之一。到20世纪30年代,苏俄渠道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阵地中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

综上所述,尽管《现代社会学》是一部转译性著作,但瞿秋白在转译过程中,已经注入了自己的理解和创新,使之富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对国人了解苏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作出了重大贡献。对这些特点的把握,有助于澄清粗枝大叶的研究所带来的误说,进而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研究,提高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研究水平。

[责任编辑:裴传永]

^① 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页。